书海泛舟

哈林顿的“蛋糕”

□孔新峰

1649年1月30日，随着查理一世的人头落地，延宕七年之久、历经两次起伏的英国内战尘埃落定了。尽管时乖命蹇，但查理算得上一位颇具个人魅力的国王。听闻国王死讯，有一位来自英格兰中部乡绅之家、曾伴随这位不走运的君主走完人生最后20个月的38岁中年人，不由得悲从中来，热泪盈眶。他就是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大洋国》的作者、英国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家。

作为乡村爵士家中的长子，哈林顿自小便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18岁进入牛津三一学院，师从著名学者奇灵沃斯。就当时的绅士教育而言，学院式的训练和天南海北的广泛游历同样必不可少，那是真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林顿除了悉心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之外，更在20岁时漫游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怀着无比虔敬之心参觐了威尼斯与罗马。在曾孕育出伟大共和制度的罗马的断壁残垣之间，他抚今追昔，良久盘桓；而威尼斯更是成了他后来在《大洋国》里盛赞的“古代经纶之道”的现世典范。1647年，他那颇富政治才能、与其同名同姓的堂兄詹姆斯·哈林顿爵士推荐他去国王身边工作，于是，查理一世和这位新来的博学侍臣就政体问题展开了多次热烈的争论。

对国王本人，哈林顿不乏同情。然而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为政治学家，他冷静地缘古知今，得出了对政治的真正洞见。查理被诛之后他沉寂了七年，继续精心研究政体问题，阅读历史，思考英国内战的原因及国家发展的前景。这七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君主制和上议院被废除了；“共和国”（Commonwealth）建立了；克伦威尔也于1653年成为权力煊赫的终身“护国公”，几乎完成了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征服。但是国内政治并没有那么清明，依然是危机暗伏、人心思动。1651年，霍布斯在巴黎出版了《利维坦》，将内战后的新政体称为“寡头政体”。哈林顿同意这个判断，对克伦威尔的独裁很不以为然，但他觉得霍布斯做的还远远不够，实则背离了古代的共和治理之道。于是，哈林顿开始写作《大洋国》，并在余生通过写作一系列政治性小册子和箴言录，为《大洋国》的政见做不懈的辩护。

《大洋国》的英文是Oceana，形式上很像一部政治小说或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但哈林顿并没有一任幻想天马行空，书中含沙射影式的人物均有所实指（如以主人翁奥尔佛斯·麦加利托影射克伦威尔，以帕西尼娅暗指伊丽莎白女王等），而大洋国也不像莫尔的“乌托邦”或培根的“大西岛”那样虚无缥缈，实际上就是指脚下的不列颠。在这本书里，他实际上讲了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对于英国内战的历史解释，哈林顿认为“产权的均势或地产的比例是怎样的，国家的性质也就是怎样的”。他将古典的政体问题与土地的分配情况联系起来，君主制与一人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的情况相适应；少部分人占有优势土地则为贵族制；土地较为平均地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则可以建立共和国。都铎王朝时代，由于地产占有权由王室、贵族和教会手中转到绅士和富农手中，因此发生革命，革命后应当建立共和制。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在上述基础上，《大洋国》为当时的英国勾画出一部宪法草案，他主张地产的相对均势，建议成立有两院制议会的法治共和国，并在内部借助共和政体设计达到强盛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海外领地。

在《大洋国》中，哈林顿讲了一个饶有兴味的小故事，在政治思想史中颇具盛名：

“比方说，假如两个小姑娘共同接到一块没有分开的蛋糕，两人都应分得一份。这时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你分吧，我来选。要不然就我分你选。分法一旦定下来，问题就解决了。分者如果分得不均，自己是要吃亏的，因为另一位会把好的一块拿走。因此，她就会分得很平均，这样两人都享受了权利……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至国家的整个奥秘，竟由两位娇憨的姑娘给道破了。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

哈林顿所谓“国家的整个奥秘”，其实就是人有欲望亦有理智，相应的人群有利益亦有智慧，但在处理公共问题时，往往两者不可得兼，这就需要一部分人（贵族，即智慧的代表上议院）讨论，另一部分人（平民，即民意的代表下议院）选择。当然，上述由两院完成的事情只是“决”的工作，还得有伟人的成分完成“断”的功能，“一个医生的国会决不会发现血液循环，一个诗人的国会也决不会写出维吉尔的伊尼斯（伊尼斯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的代表作史诗《伊尼特》的主人公）”。其实吾国民间早已领略个中精义，君不见乡下老农也熟知“你盛粥，我挑碗”的道理，而好友欢宴之际更能体现出“谁分酒，谁后取”的惯例。

《大洋国》完成了哈林顿与先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的对话，也在霍布斯在世之时完成了对其理论的有力批评。此后，哈林顿开始与同时代人论争，捍卫自己的共和理想。不过，护国公对这部书大发雷霆，咆哮“人家以刀剑打下的江山，岂能因一粒纸弹的攻击而轻言放弃？”勒令扣留书稿，不予印行。多亏此时出现了一位奇女子——护国公的爱女伊丽莎白·克莱波尔——“她极具自然地具有公主的风度，对所有人能以礼相待，并经常为不幸的人说情”，在她的帮助下，《大洋国》才得见天日，重新出版。但是，哈林顿的不幸仍在继续，1658年克伦威尔逝世后，他又写下了《立法术》《政治体系》等书，更发起成立了致力于共和事业的“罗塔俱乐部”（the Rota Club），终于在查理二世复辟后被捕，囚于伦敦塔，备受身心创伤。翌年被释后，尽管在桑榆晚年结婚成家，但晚景凄凉，于1677年的在威斯敏斯特病逝。然而在他身后，彰扬古典共和公民理想的“新哈林顿学派”在英蔚然兴起，美国的两院制和参议院轮换制实乃拜其所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因其唯物论和经济基础决定论色彩褒扬他，20世纪的剑桥共和主义史家更将其奉若至宝。在政治思想史的群星之中，哈林顿将和他的“切蛋糕”之道一同留诸长远。

斗转星移，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和福利国家的创制，自20世纪中期以降，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为现代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今人往往喜欢用“做蛋糕”与“分蛋糕”，作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与进行财富分配的形象譬喻。然而，“做蛋糕”与“分蛋糕”恐怕都存在一个审慎衡平的问题。“蛋糕从哪里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单凭政府之手搞起来的，而是主要依靠亿兆生民及其经济组织在市场环境下凭借智慧与勤劳做出来的；“蛋糕该怎么分？”不是“强凌弱”，也不是“众暴寡”，更不是绝对权力的“朕给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你不要抢”，而是由法治框范、阳光运行、制约协调机制科学有效的公权力，进行公平可持续的保障和合理有序的分配。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者实乃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三个半世纪之前的哈林顿手执切刀，拈糕微笑，时时提醒我们——现代政府是在法治规约下应民意懂技艺的“分糕的”，决不是越俎代庖的“做糕的”，更不是盛气凌人的“卖糕的”（“My God”）。

编者按：4月24日，李克强同志在考察严复故居时提到，严复的翻译确实做到了信、达、雅，还提到插队时读过《天演论》。在严复的译著中，《天演论》被视为各著之首，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本文试对此做出分析，供读者参考。

《天演论》推动改革的理论译著

□吴文珑

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上，严复在译介西方理论学说方面可谓成就卓著，毛泽东以及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都对他的这一贡献交口称赞。

严译《天演论》当时产生的轰动效应，相当程度上缘于严复把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同中国现实紧密结合了起来，或者说，在于严复将外国的思想译述和改造为一种能够服务于当时中国需要的理论。众所周知，《天演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进化论的译著，它通过自然科学的诸多事实，阐明了生物界物竞天择、进化无已的客观规律。然而对比赫胥黎的原作与严复的译作，我们便可发现，原作本身与中国现实几无关联，但是经过严复的改造、取舍和依据现实的“取便发挥”后，《天演论》俨然成为了一部指导中国现实改革的理论著作。严复是在甲午战败的巨大阴影下着手翻译《天演论》的，他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就是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和士大夫抱残守缺、愚昧无知、不愿改革的这种客观现实，强调进化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所有国家都如此，“虽圣人无所为力”的“运会”。唯其如此，国人不应再因循保守、夜郎自大，自以为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就不会亡国灭种；唯有紧跟时代、学习新知、团结奋进，方可“与天争胜”，使国种永存而不坠。

这样，《天演论》便以深邃的思想和爱国的激情，给患难的国人以振聋发聩的启蒙影响和无法忘怀的深刻印象，立即给当时处在“学问饥荒”中的知识分子和革命派人士，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激起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热忱。这正如时人所言：“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然而《天演论》的影响并不止此。国人通过读《天演论》，还获得了一种观察事物和指导日常行动的方法、观念和态度。《天演论》赋予人们一种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等万事万物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新的发奋自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乃至其后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天演论》出版后的数十年间，类如“自强”“自立”“自主”“自存”以及“争存”“演存”“进化”“物竞”等语词盛行不衰。据曹聚仁回忆：“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那是严氏的译介本”，“如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鲁迅说他的世界观，就是赫胥黎替他开拓出来的。那是从‘洋鬼子’一变而为‘洋大人’的世代，优胜劣败的自然律太可怕了”。这是《天演论》独创贡献之所在，亦是此书能够风行长久、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大原因。

严复在《天演论》出版一年后说：“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虽显自大，但之后的事实却证实了他的这个说法。当严复日渐为历史的大潮所湮没的时候，《天演论》仍在起着作用。

重点推荐

失衡与调适：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态

本报讯（记者 吕红娟）社会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社会心态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一些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心态问题令人忧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可以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负向的社会心态和情绪则会给社会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困扰，亟待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为此，《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5期“本刊策划”栏目特别策划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心态”这一选题，邀请相关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发读者对社会心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本次选题策划从不同角度组织了7篇文章。本刊记者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周晓虹的访谈文章，主要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周晓虹是“中国体验”的提出者，多年来一直致力社会变迁、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当前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社会心态问题和倾向呢？就这个问题本刊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社会心态蓝皮书》的主编之一王俊秀撰文给予分析解答。《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失衡与调适》的作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他的主要著作是《整合社会心理学》《转型期的中国人》等，对社会心态问题深有研究。《群体性事件背后的社会心态》一文的作者单光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在这篇文章里，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群体性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并希望引起社会管理者的注意。针对当前社会比较关注的领导干部心态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撰写了《领导干部心态变化与心理调适》。社会信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舆论普遍认为当前存在信任危机的背景下，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撰写了《当下社会“信任困境”的形成与破解》一文，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马福云撰写的《以预期管理来引导社会心态》，提出如何以预期管理技术来引导社会心态，防止非理性心态过度蔓延。

“本刊策划”是《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的重要栏目。每期就某一个热点问题邀请学者或官员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自栏目开办以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已经陆续策划了“聚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效推进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凝聚全民共识 推进国家认同”“省直管县：利弊争议与改革方向”“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要选题，引起广泛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和《学习时报》同属中央党校报刊社。中央党校报刊社主办的媒体还有《理论动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理论网等。

从阅读中走向“一带一路”

□许民彤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近日，先是看到中国首部“一带一路”学术专著《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出版发行的消息，一些地方的“一带一路”主题书展也时常见诸新闻。另外，很多出版社正在加紧推出“一带一路”题材的图书，正在出现“一带一路”图书热。

《丝绸之路》：重走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历来是图书出版的重要题材，笔者曾看到有关“丝绸之路”的好几种图书，其中有历史类的，也有文学类的；著作者既有国内的历史学家，也有国外的汉学家。去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迎胜所著的《丝绸之路》。为完成《丝绸之路》这本学术著作的写作，作者曾三次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与“游牧/阿勒泰丝绸之路”实地考察，积累了丰富、直观的第一手历史材料。

《丝绸之路》分为两卷，上卷为“草原丝绸之路”，下卷为“海上丝绸之路”。全书以时间为经，以文明交流为纬，全面系统阐述了两条丝绸之路的发端、发展过程，详细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民族、文明类型及其相互交流的历史状况，展示了数千年来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宏大历史场景，分析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

富有历史新意的探索

近十多年来，随着安伽、史君等粟特首领墓葬在中原出土和大量汉文墓志的新刊，来华粟特人及其历史文化成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热点。去年8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荣新江所著的《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一书。这是作者继出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之后，又一部汉唐中西文化交流的力作。此书也是“一带一路”主题书展重点推介书目。

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丝绸之路的繁华往昔，大唐与西域的文明交织，是后人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在写作此书过程中，作者立足本土，兼具国际视野，在掌握尽可能丰富的史料特别是墓志资料的基础上，力图以陈寅恪所倡导的历史研究的“通识”方法，对前所不详的粟特文明，做出了富有新意的探索。

首部“一带一路”学术专著

201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此书被一些文化、书评媒体称为“中国首部‘一带一路’学术专著”。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说，本书首先将“一带一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进行了比较，又与中国——中东“现代丝绸之路”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一带一路”的历史、战略、举措问题：如何理解新时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时代性和战略性，尤其是其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谋划的重大意义。“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性，在于通过“一带一路”进一步推动西部开发与向西开放，长远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理想愿景是，扭转长期以来经济重心沿海化、东西部发展和海陆开放严重失衡的现状，实现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海陆地缘平衡，构筑东西互济、海陆统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中国国内市场和亚欧大市场的协同联动，建立起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等、共享、共赢的新型经济循环。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5期要目

决策要闻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

本刊策划

转型期中国社会心态（共7篇） 周晓虹等

理论视点

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是实现依宪治国的关键 张 震

改革纵横

房地产税的五大正面效应及争议回应 贾 康

中国经济正在筑底企稳

——对2015年一季度国内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张立群

社会治理

借助移动互联网推进出租车行业市场化改革 蔡继明 姜 宁

治党论苑

协商民主的认识误区和当代性 杨雪冬

环球视野

巴基斯坦“恐怖主义避风港”的形成与根除 王 琦

多语种宣传“依法治国”理念

本报讯（记者 王翠娟）日前，《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已由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成英、法、西、俄、日、阿、德七种外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三个重要文件的译文。

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理念和重要举措予以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文件多语种外语翻译和出版，对于广泛宣传四中全会精神，使国际社会了解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和战略部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出版动态